

“日本侵略亚洲战争 责任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陈丽菲 苏智良

2003年9月18日至9月20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主办,《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上海史学会、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协办的“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上海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政府部门人员、史学研究者、日本侵略亚洲战争受害者、律师等12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韩国、美国、日本、菲律宾、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等国家和地区,另外海内外30多家媒体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慰安妇”、强制劳工、细菌战、毒气战及遗留毒气弹处理、战争赔偿等问题。现将会议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一 关于“慰安妇”问题

这次会议是各国“慰安妇”首次在中国聚会。中国大陆的陈金玉、台湾的林沈中,韩国的李容洙,菲律宾的 Mr. Lola Beatni Tuarzon 等受害者,分别就自己所遭受的性奴隶经历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她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必须对战争负责,认罪并赔偿。原海南日军“慰安妇”幸存者陈金玉这样叙述自己的苦难经历:“我叫陈金玉,生于海南省保亭县,黎族人。被日本兵糟蹋的那一年,还是一个才16岁的孩子。1939年日军进攻保亭县,并不断强抓当地村民作为劳工为日军修路架桥。1941年初,我被日本兵

抓住,编入日本人的‘战地后勤服务队’。被编成‘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白天被迫为日本人干活,晚上则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在被抓进据点的第 7 天,我被日本军人糟蹋,作为一个孩子的我,痛苦的感受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被关进据点的几年里,我们这些‘战地后勤服务队’的姑娘几乎天天要受日本军人的折磨,有时多至二三人,少则一人。到现在我身体还经常忍受着那时候遗留下来的疾病的痛苦。现在我一个人生活,日子过得很苦,我恨日本人。”

与海南‘慰安妇’一样有苦难经历的台湾老人林沈中控诉,“慰安妇”经历使她一生中受到极大的伤害,她结过 4 次婚,离了 3 次,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每一任丈夫都无法忍受我过去曾做‘慰安妇’的事情”。韩国的李容洙和菲律宾的 Mr. Lola Beatni Tuazon 也分别就自己“慰安妇”的痛苦经历,控诉了日军施害者。

有学者指出,原“慰安妇”受害者不断地上诉和与日本政府坚决斗争的决心,已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也得到了来自日本国内人民的支持。迫于压力,日本政府近年才开始重视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日本参议院 2001 年 3 月 21 日提案审议《促进解决战时性强迫被害者问题法律案》,首次承认了日军对亚洲国家女性受害者实施的“战时性强迫”。但是,在现实事件中对原“慰安妇”问题的处理上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有台湾学者建议,对受害“慰安妇”实施“幸存慰安妇晚年身心照顾计划”。台湾成立的“阿嬷心理治疗工作坊”,就是为身心受创甚深的原台湾“慰安妇”所设计的一个治疗团体,已经工作 4 年。

二 关于生化武器问题

关于日军细菌战,来自湖南的代表对常德细菌战及其毒害情

况进行介绍。湖南常德在 1941 年 11 月和 1943 年 11 月两次遭遇日军细菌战, 受害人达 7693 人之多。许多村庄因为受细菌侵害而无活口, 惨痛之极。来自云南保山的代表介绍日寇在滇西烧杀奸淫、投放细菌弹的罪行。在云南保山, 日军派特务、汉奸混在逃难的人群中, 在饮水中投放霍乱病菌, 用飞机投放细菌弹, 用人体进行活体实验, 在滇西散布鼠疫等, 受害严重程度极深。其中因霍乱病菌而死的云南省人就有 18 万, 仅保山就有五六万人。鼠疫的危害更是延续很长时期。日本学者还对七三一部队细菌战情况及其相应赔偿情况进行介绍。

关于日军毒气弹遗害, 中国学者介绍了从 1950 年至今中国受害及受害者诉讼情况。并指出: 日本国在 1995 年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中国在 1997 年批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按照国际公约, 日本必须履行处理中国国内遗弃化学武器的义务。但是, 实际上日本在处理战争遗弃毒气弹问题上, 并没有认真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 在对因毒气弹受害者的赔偿方面, 受害者没有得到日本方面满意的答案。

还有人提出, 不久前发生的“8·4”齐齐哈尔毒气弹事件, 就解决毒气弹事件而言是一个良好机遇。日本政府可以利用此次毒气中毒给中国人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害的机会, 认真反思战争责任问题, 进一步处理好日本侵略中国遗留毒气弹问题。但是, 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没有认真去这样做, 而是图谋派遣调查团来隐瞒事实真相, 隐瞒与毒气弹有关的相关信息, 甚至在治疗方法上也不给中国方面提供最新的技术指导, 企图用敷衍的态度来蒙骗中国政府和人民, 为了经济利益而不向中国提供最先进的毒气医疗设备。一些日本代表也指出日本政府的这种错误做法, 是以回避性结构的极端的表达方式, 就是常用“遗憾”代替“谢罪”, 它暴露了日本独有的体制上的弱点。从这件事也可看出, 这种带有政治性的

歪曲和回避事实的做法,只会唤起受害者和受害国愤怒的感情。日本政府应该尽早拿出勇气选择谢罪的措辞并提供必要的补偿。从国家管理的角度来说,这也是日本政府进行危机管理,重塑国家形象的最好机会。

三 关于劳工问题

与会的受害劳工代表有 11 人,现为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退休教授凤仪萍先生以个人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中国劳工的深重苦难。那是 1944 年,他还是 14 岁,在上海过四川路桥时因没有携带“良民证”而被日兵押运到北海道夕张栗山町角田煤矿挖煤。强制劳工工作分白班和夜班,白天早上 4、5 点钟下去挖煤,一直干到晚上 11 点,合格完成才可下班。劳动强度很大,挖煤的时候,趴在地上,煤屑直插到肉里,出来时,眼睛头发脸上全是煤屑,连痰都是黑色。10 年后他吐的痰还有黑色的煤屑。住的是木板房,只给一条很薄的毯子和一套帆布工作服,冷了就把那个毯子卷起来绑在身上去劳动,晚上回来当被子盖。吃的很少,1 两饭不到,肚子里一天到晚都是空的。从不洗澡,身上满是虱子、跳蚤、臭虫,日本人就叫他们“支那虫”、“南京虫”,骂他们是猪。劳工稍有不从,就会受到残酷的惩罚。他曾在一次反抗中,中指就被砍了一截,到现在还隐隐作痛。对他们来说,死亡是很自然的。他目睹了许多劳工死亡,在井下劳动时,稍不注意,监工的十字镐就把劳工的脑袋敲开了花。有人想逃,结果被抓回来活活打死。仅仅 1 年时间,他的同事被打死、病死、饿死以及自杀的高达 98 人。凤仪萍是 1945 年 9 月被到北海道寻找美国战俘的美国军人救出,幸免于难。他说,过去的劳工生涯造成了他一生精神上、身体上的创伤,有悲痛、愤怒和痛苦。最后凤仪萍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本政府应向德国学习,

向中国人民谢罪,必须承认抓劳工是错误的;(二)不能再参拜靖国神社;(三)真诚向受难者及其家属道歉赔偿。

在会场散发的中国被强掳到日本的战俘劳工及亲属受害者联谊会(筹)起草的《致日本国内阁的公开信》中,向日本政府提出了5项条件:(一)正视日本军国主义强掳、奴役中国战俘、劳工的历史,承担政治、法律、道义上的责任,公开、郑重、诚心诚意地向二战劳工受害者进行谢罪。(二)全面公布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的历史档案,对没有搞清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主动清算强掳战俘劳工的罪行,对残害劳工而没有受到历史审判的当事人,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三)建立战俘劳工赔偿基金,全面解决二战劳工问题,对被强掳到日本的4万中国劳工受害问题进行整体解决,对受害劳工的身体损失、精神损失、家庭损失,给予适当的经济赔偿。(四)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对于在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受害的中国劳工,对受伤者给予体检、治疗;对于死难者,应该给遗属以通知,说明原因。对于各地没有归还的劳工遗骨,日本政府应该积极寻找,尽快送还。(五)在日本和中国适当地方,修建中国殉难劳工纪念碑,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用真实的历史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正友好。

四 关于民间赔偿问题

日本侵略亚洲的赔偿运动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韩国劳工最先发起,至今日本战后赔偿案件达60余件,其中原告总数达1027人。民间赔偿主要包括劳工赔偿、原子弹受害者赔偿、“慰安妇”、细菌战受害赔偿等方面。日本政府作为被告的案件有35件,上诉案件绝大部分是以败诉告终。赔偿运动的主要方式有:起诉、庭内和解、庭外和解等。在达成和解的所有赔偿案中,和解的对象

只是日本的部分企业,日本政府还从未跟原告和解。日前在赔偿中主要碰到的问题是时效问题、国家无答责问题和受害者要求个人赔偿的主体资格问题。前两个问题已有突破,最后一个问题一直存在颇多争议。与会代表基本上达成一个共识,即希望日本政府尽早立法,明确自己的战争责任,并且援用国际和解惯例等推进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时,王选、王工等中方人士还注意到导致民间索赔失败的另一原因,即国内对日本相关法律不够了解,尤其是民间对日本更不了解,这是一个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本次大会着意为“慰安妇”代表安排了大量的发言时间,使得“慰安妇”索赔案格外受到重视。

为取得对日战争索赔的实质性进展,争取日本政府的公开谢罪和国家赔偿,与会代表建言: 1. 亚洲各国的受害者应联合起来,发起多国家多民族联合运动。2. 争取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ILO 及其他国际机关的支持,以劝告和决议方式支持战争赔偿事业。3. 受害国政府和议会应联合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4. 受害国、国际机关与日本国内运动联合起来开展跨国斗争。王工律师还提出,日本应以其“二战盟友”德国为师,实行“官民并举的和解”,建立日本式“记忆·责任·未来”基金,与中国民间协商,谋求政治和解。尽管日本自民党、社会党等参与运作的“国民基金”于 1995 年开始运行。截止到目前,“国民基金”赔偿韩国、台湾、菲律宾受害者共 285 人,金额仅为 5.7 亿日元,且已陷于停顿。

五 关于历史教育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有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对年轻一代的历史观教育。当代对待日本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要力图从教育年轻一代的观点出发,对中国、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下

一代进行历史教育。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进行教育。有人指出,日本青年一代中,有30%以上的人对过去战争认识有错误。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与德国、意大利两个国家不同的是,日本的战争教育强调日本是一个“受害国”,从而否定了侵略战争的责任。为让更多的日本人了解历史真相,代表们建议,要把“慰安妇”问题、毒气弹问题及强征劳工问题等内容写进各国的历史教科书,教育青年一代正确认识历史的真相。现在正在编写中、韩、日三国共同的历史读本,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还有人提出,进行历史教育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网络方法。为此,已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建立专门的网站,对青少年开展历史教育,“918”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该网站宣传人员称,中国“918”网站成立于2000年3月24日,因“大阪事件”而建立,网站宗旨是:不忘民族屈辱、反思历史教训、探讨强国之路、凝聚中华精神、增进民族了解、倡导人类和平。该网已经产生广泛影响,取得值得借鉴的经验。

会议代表还参观了浦东旗昌栈日军慰安所遗址,代表们为该慰安所如此大的规模而震惊。关于对战争遗迹的保护利用问题,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长李竞芬女士、王工律师等,倡议保护好上海抗战纪念地——四行仓库,并在上海日军慰安所遗址设立纪念馆。该倡议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成。上海会议是日本国家战争责任系列会议中的第二届,首届会议于2002年5月在平壤举行,第三届会议将于明年在平壤举行。

(作者陈丽菲,1959年生,上海师范大学文化典籍系副教授;)

苏智良,1956年生,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